



姚晓峰 以年轻人视角呈现大运河

记者 何玉新



姚晓峰

著名导演,1969年出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执导电视剧《大丈夫》《虎妈猫爸》《小丈夫》《恋爱先生》《带着爸爸去留学》《假日暖洋洋》《北上》《追风者》等。

演员围坐在小院里
像家人一样唠嗑儿

拍摄前的角也非常困难。姚晓峰说:“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在选角色,选每一组家庭。包括剧中的几个妈妈,需要塑造出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除了勤劳、质朴、善良,还有没有个性?个性的差异在哪儿?男人也要明显不一样,很难找。对导演来说,角色选对了,电视剧就成功了一半。”

他举例说:“女主角夏凤华和她妈妈李燕像姐妹一样,都很善良,这个家是女性当道,两个女人都特别能干,老爹基本是个闷葫芦,选这一家人的演员时,我们考虑了很多因素。马思艺这个角色设定是意大利混血儿,找什么样的演员来演呢?我们想去找少数民族演员,迟迟定不下来。直到开机前,踏破铁鞋无觅处,一个叫李宛妲的女孩突然出现,一见面,我觉得就是她了!还包括演小思艺的演员,是苏州一所外国语学校的小孩,完全不会演戏,但那个劲儿在。”

当地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允许摄制组搭建外景。姚晓峰心里早就有了一条花街,把自己的想象传输给团队,大家一起完成这个空间的营造。

他们改造了附近的街道和小巷,铺上青石板,搭建起一座小院,以及牌坊、酒楼、货运码头等。从这时开始,一条花街、一方小院、一条生生不息的大运河,逐一展现在镜头之中。

在牌坊上,姚晓峰题了两句诗,作为它的对联:“沉船侧畔千帆过,百年新事归平淡。”也许对仗并不工整,但表达出了他内心的思想:“船沉了,并不代表结束,还会有关新船从它身边跨过;无论多么波澜壮阔的人生,也会归于平淡。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眼光再放长远一点,格局再大一点,面对宇宙,人就很渺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能过得去,什么都有新的开始。花会一季季地开,就像剧中夏凤华所说,我的花开了,还有新的花会开。”

姚晓峰说:“巴城本就是旅游旺地,紧靠阳澄湖,每年相应季节都有很多人来吃大闸蟹,然后在附近转一转、看一看。搭建的操作难度很大,但最终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让它贯穿百年,营造出厚重的历史感。”在姚晓峰看来,拍电视剧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空间环境,因为有什么样的环境,就能塑造什么样的人。有了花街,所有的演员自然而然就有了一种归属感,内心也产生了令人羡慕的、人与人之间非血缘的亲情。“可能这个东西就对了,这个场就对了。可能这里也有我的一种偏执吧,搭这条街很不容易,假如自己没有强大的意念,也就放弃了。”

电视剧《北上》的序章中,年幼的夏凤华牵着初来乍到的马思艺,穿行于周家、夏家、谢家,最后步入邵家,一个超长的长镜头一镜到底,也引领观众走进了这个温暖朴实的花街小院。这是花街真正的意义所在——这里既承载了大运河的灵魂,也孕育着世代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人们。

回顾这段岁月,回顾创作过程中的曲折,姚晓峰感慨:“大运河象征历史与现代的交汇,普通人的命运如潮水般涌动。希望通过《北上》这部剧,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大运河的价值,感悟家国情怀与人间烟火带来的温暖。”

姚晓峰访谈
流水生生不息
可以包容万物

记者:您从小在河边长大,水对您的性格以及价值观有哪些影响?

姚晓峰:可能正是因为在水边长大,我总觉得什么也不缺,有一种富足感,很容易满足。对于水,我的体会是——生生不息。除了流动性以外,水是不断生发的东西,后浪推前浪。水生万物,以柔克刚。你看我长得五大三粗,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柔性的,虽然骨子里很坚韧,但不会那么硬刚,可能这就是水对我的影响吧。还有一个,水的包容性很强,我也是这样,我对什么事情都很包容,没有那么针尖对麦芒,没有那么强烈的攻击意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说得都有道理,到今天为止,我也是这样想的。

就拿做导演这件事来说,导演应该是一个集大成者,我很惭愧,我到今天为止,取得的这些成绩,正是因为吸收了很多优秀人才的精髓。在日本,导演叫“监督”,一个导演,就是把所有人的智慧集中起来、汇总起来。导演当然需要有一定的才华,但更要善于吸纳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对我自己人格、性格的形成都是有帮助的。

记者:《北上》是对大运河文化的展示,也是对社会变迁的深刻观察,您最希望传递给观众什么?

姚晓峰:我希望通过这部电视剧,将大运河这一文化符号与现代观众的情感结合起来。2014年,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在电视剧中,北上的年轻人借着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契机,回到花街。大运河在两岸人家身上留下的烙印,不仅是对时代的回应,也是对自我的叩问,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儿出发的。



电视剧《北上》剧照

记者:拍《北上》给您带来了哪些收获?

姚晓峰:《北上》打开了我对大运河的兴趣,我又看了很多关于运河的书,包括单霁翔先生的《大运河漂来紫禁城》,原来北京城是这么建起来的。传统文化也好、历史也好,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库,只要好好地去打开它,都会有收获。我现在对历史特别着迷,读历史越多,越发现历史好像离真相不是那么近,所以我想通过拍一些东西,或者去挖掘这样的东西,来探寻真正的历史,希望能有所成吧。我也希望大家喜欢历史,都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记者:接下来您会拍哪些新作品?

姚晓峰:未来我已经确定好的计划,肯定是继续做历史的东西。第一个准备做“南京三部曲”,也就是我的家乡,我的城市,根据叶兆言老师的小说《仪凤之门》和《南京1937》,把南京的建都史、建城史拍成系列;第二个也是改编的剧本,正在创作,是关于宣纸的故事,叫《一纸千金》,我对这些东西很着迷;第三个是一个民国故事,我前面拍过《追风者》,后面还会继续拍,用金融视角,展现民国时期的经济史。

有足够的沉淀,而对于影视改编来说,关键在于怎么把这种厚重性保留下来,又要具有可视性和现代性。我和徐则臣、赵冬苓两位老师坐下来讨论,确定了方向——从2000年讲起,以一群‘90后’为主视角,用青春的目光回望历史,以年轻一代的昂扬姿态拥抱时代浪潮,尊重小说的精神内核,抓住它的寻根主题,也对它进行新的解读。”

因此,电视剧《北上》讲下的故事,但仍坚持了寻根主题。现代化进程中,高速公路、高铁发展起来,水路运输逐渐衰落,大多数“靠水吃水”的人被迫上岸,虽然生活质量提高了,但也有一种失落感。剧中,谢天成的跑船生意破产,妻子梁海泓为维持生计改做货车司机,儿子谢望和前往北京创业。马思艺远赴意大利探寻身世之谜,陈睿则在花街追溯家族往事。历史的迷雾散去,个人的命运与大运河的流转交汇,而构成这些流动和包容故事的,正是在大运河旁边长大的孩子。

将虚构的花街
变成真实所在

花街,是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的一个故事背景,又出现在《北上》这本书中。而在姚晓峰看来,花街与大运河、书中人物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拍摄《北上》,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个场景。

“北方的大运河,离人生活的地方有一点远,它就是一条河。编剧赵冬苓是山东人,大运河就从她所生长的小城经过。孩子们到河边去玩儿,一定要先跑到大坝上,然后下去,才能走到大运河。直观上没有问题,但从影视拍摄角度来讲,就觉得关联性太少了。”姚晓峰说。

在小说中,徐则臣虚构了花街,在现实中它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每个人读完小说以后,都会在心中形成一条“自己的花街”。徐则臣带着姚晓峰等人去淮安的花街,而姚晓峰觉得,“好像又与小说里描写的花街不太一样”。

直到他们走到苏州巴城古镇,来到大运河边,那一刻,姚晓峰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震撼:“大运河离我这么近!就在巴城古镇

边,有一条河横穿而过,然后大船驶过来,像山一样挡住视线。我觉得真正找到了水和人亲密的共生关系。”眼前正巧有一片空地,大约两千多平方米,刚刚被扒掉的旧房子。姚晓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地方太好了,我能不能在这里搭建一座小院?”摄制组团队表示反对,说操作起来太难,需要跟当地政府申报。

当地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允许摄制组搭建外景。姚晓峰心里早就有了一条花街,把自己的想象传输给团队,大家一起完成这个空间的营造。

他们改造了附近的街道和小巷,铺上青石板,搭建起一座小院,以及牌坊、酒楼、货运码头等。从这时开始,一条花街、一方小院、一条生生不息的大运河,逐一展现在镜头之中。

在牌坊上,姚晓峰题了两句诗,作为它的对联:“沉船侧畔千帆过,百年新事归平淡。”也许对仗并不工整,但表达出了他内心的思想:“船沉了,并不代表结束,还会有关新船从它身边跨过;无论多么波澜壮阔的人生,也会归于平淡。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眼光再放长远一点,格局再大一点,面对宇宙,人就很渺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能过得去,什么都有新的开始。花会一季季地开,就像剧中夏凤华所说,我的花开了,还有新的花会开。”

姚晓峰说:“巴城本就是旅游旺地,紧靠阳澄湖,每年相应季节都有很多人来吃大闸蟹,然后在附近转一转、看一看。搭建的操作难度很大,但最终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让它贯穿百年,营造出厚重的历史感。”在姚晓峰看来,拍电视剧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空间环境,因为有什么样的环境,就能塑造什么样的人。有了花街,所有的演员自然而然就有了一种归属感,内心也产生了令人羡慕的、人与人之间非血缘的亲情。“可能这个东西就对了,这个场就对了。可能这里也有我的一种偏执吧,搭这条街很不容易,假如自己没有强大的意念,也就放弃了。”

电视剧《北上》的序章中,年幼的夏凤华牵着初来乍到的马思艺,穿行于周家、夏家、谢家,最后步入邵家,一个超长的长镜头一镜到底,也引领观众走进了这个温暖朴实的花街小院。这是花街真正的意义所在——这里既承载了大运河的灵魂,也孕育着世代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人们。

1965年,麦收时,他在打麦场干农活,见到刚刚投入使用的锥形小麦脱粒机,觉得特别神奇,萌生了以后把这个场面画下来的想法。

转年春天,他又看到生产队的老队长高粱苗,身板挺拔,两眼看向前方土地上的苗垄,双手握着大锄板,上下翻转、左右开弓,龙飞凤舞一般,妙趣横生,魅力十足。高粱的小苗原本长得乱糟糟的,经老队长用锄头开过之后,苗距一尺,笔直一行,苗根无草,干净利索!老队长说,这种开苗方法叫“大开膛”,是最好、最高级、最大气的开苗技术。丁连举想,有朝一日要把这开苗的场景画下来。再有就是从井里打水,如果不能熟练掌握打水的技术,水桶多半会落入井底,而会干的人动作一气呵成,轻松巧妙。

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农村旧日的场景已消失不见。丁连举想用画笔记下这些民俗,留下宝贵的民间技艺,留住乡愁。

2016年,丁连举整理创作40多万字的《蓟县民俗录》正式出版,同时自己绘出60幅插图,展现了当地的农机具、民俗和生活场景。2017年12月,他因长期熬夜用电脑打字,导致左眼视网膜脱落,做手术后一个月看不了电脑,就画民俗画,一天画一幅,把多年来的生产生活片断捡拾起来。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他把这些画分成七个章节编辑成册,在天津丁氏文化研究会的帮助下,《农家俗画》正式出版。画面中都是他干过的农活、玩过的游戏、看过的场面、听到的故事。他陆续把画作发在朋友圈,不少朋友看后都给了他赞誉和鼓励。

区党史办出版的《盘山风云》中。

2006年春天,丁连举翻盖老家的房子,不小心腰椎骨折,只能遵医嘱在家里仰卧躺着。这位闲不住的人抓紧时间阅读民俗类书籍,受到启发,把电脑显示器放在身侧,用两腿卡住键盘打字,写出了6万多字的《蓟县民俗录》初稿。

他还参与了《蓟州人物》《蓟县文化志》《蓟县文物志》《花宝村文集》《金振东纪念文集》《蓟县文化资源汇编》《蓟州故事》等多部书籍的采写、编辑。完成了上仓镇程家庄民俗馆、桑梓镇红旗庄村史馆、小穿芳峪民俗画廊的布展。也曾在许家台镇大石峪村、东二营镇北高庄村、桑梓镇常各庄村指导村民开展民间游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好多游客主动参与其间,意趣盎然。

民俗画记录过往
留住珍贵的乡愁

四五岁时,丁连举喜欢上了画画。家里没有纸,但有几本旧时的线装书,折页装订,一面印着文字,另一面是空白,爷爷便把书拆开,让他在空白页上画画。

他画民俗画的意愿由来已久。

2018年,蓟州区图书馆及七个乡镇先后举办“丁连举民俗画展”。首届“蓟州区农民丰收节”也展出了他的民俗画,那些带着泥土味儿的民俗画,引起了很多人共鸣——中老年人说,这些画带着他们回到了过去的年代;年轻的朋友说,原来过去的农民是这样生活的,太不容易了。2024年,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百业兴旺·中国农民画大展”,他的画作《蓟州农村四季》获创意奖。

深挖《三字经》中窦燕山
创作一系列民俗画册

丁连举奔走于各个乡镇和村庄,发现了不少民间“宝藏”,比如窦燕山优良家教故事、周玉山中医正骨、英歌寨穆桂英故事、马伸桥中幡表演、赵庄李宪军臭豆腐等。2018年以来,他参与了这些项目的保护传承,多个项目进入蓟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

《三字经》中提到:“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是蓟州区西龙虎峪镇龙前村人,生于唐末,卒于后周,官至右谏议大夫,以教子有方名垂青史。

载于《范文正公集》的《窦谦议录》,是研究窦燕山的重要参考资料。丁连举寻找多年,没找到原著。中央美院赵雪薇博士等人来蓟州区农村调研,之前他们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丁连举的两本书作参考。见面时,丁连举托赵博士再去国图时帮忙找《范文正公集》,看其中是否有《窦谦议录》一文。

几天后,赵博士发来了《窦谦议录》的电子版。

《窦谦议录》中有记载,某年正月十五,窦燕山去延庆寺逛花灯,捡到一包

金银,内有白银200两、黄金30两。蓟州有延庆寺吗?丁连举对蓟州大部分乡镇进行考察(最终完成了20万字的《蓟州寺庙故事》书稿),也没找到延庆寺。后来他在礼明庄镇发现,此地曾有延庆寺,但又觉得这里距窦燕山所在的龙前村太远,而龙前村与玉田县仅隔一座山,延庆寺会不会在玉田县?他翻阅《玉田县志》,还真发现了这座寺庙。又听龙前村的老人说,村南约5公里处有个村子,曾有延庆寺,但早就不存在了。丁连举推测,当年那座延庆寺就在玉田县。另外,他还想方设法在凤凰山找到了窦燕山书院的遗址。

2022年,窦燕山传说故事被批准列入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丁连举觉得,把这些珍贵的历史传承下去,自己责无旁贷,他通过查阅史料和实地走访搜集传说故事,撰写历史小说《窦燕山传奇》即将完成。龙前村为他颁发了荣誉村民证书,感谢他为窦燕山文化传播作出的贡献。

丁连举,这个不享受任何待遇的民俗专家,“不用扬鞭自奋蹄”,一个一个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完成了一系列民俗画册——《农家俗画》《农家百物》《农家童趣》《农村百业》,为蓟州区东二营、穿芳峪等九个镇和桑梓镇桑梓村、侯家营镇西桥头村、穿芳峪镇东水厂村等九个村完成了文化资源调查,写出了18本500万字的书稿及资料。

已经77岁的丁连举仍然在东跑西颠。其实,他因为过度熬夜,导致双眼视力大减,家人和朋友常劝他歇歇,他却摇头说:“好多事还没干完呢。”

丁连举跑了多少路?他的山地自行车上有计程器,2014年到现在,总计3万公里。哪有个完呢?如此辛苦,不为名利,只为留住乡愁。

踏遍400多个村庄,记录500万字资料,手绘2000多幅民俗画

带着泥土味儿的民俗专家

讲述

文 董秀娜

他不是学者,却研究了40年蓟州民俗,卓有成就;他不是文史专家,却深入挖掘窦燕山文化,成为市级非遗传承人;他不是画家,却创作了2000多幅民俗画,在多地展出;他不是作家,却写出了《蓟县民俗录》《农家俗画》《农家百物》《农家童趣》《农村百业》《桑梓轶事》等专著;他不是记者,却骑着自行车跑遍了蓟州大地,探寻历史、民俗和故事。他叫丁连举,被蓟州的老百姓誉为“来自民间的民俗专家”。

走遍蓟州乡村
收集民俗故事

1948年,丁连举生在蓟州桥头庄村。幼时抓周,桌子上放着各种小物件,他伸手从最远处抓起了一支笔。爷爷大笑:“我孙子这辈子要拿着笔讨生活!”上初中一年级时,学校组织数学竞赛,丁连举获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本名为《徐寅生谈怎样打好乒乓球》的书。初中毕业后,他参加了县卫生局开办的半农半医培训班,为期三年,边学边行医,此后便在村里当医生。1975年,他考上了民办教

师,在乡办初中代课,白天教书,傍晚仍回村行医,深夜给学生批改作业,后来又当了高一物理代课老师。1985年6月,丁连举担任了下广播站的通讯员,写新闻稿,还写了以歌颂新民风为主题的小小评剧《卖猪记》,在市里获了奖。那时他一边深入乡村采访新闻,一边收集各种民俗,陆续走遍了蓟州400多个村庄。有一次,他到杨津庄镇黄土坎村探寻“黄土坎之战”的信息,见大埝上坐着几位老人正在聊天,经询问,其中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叫黄运理,曾参加过那次战斗,还以亲身经历写下了《黄土坎之战》的顺口溜。丁连举一字一句记下了这段顺口溜。多年来,他陆续采访写出了50多万字的红色故事,整理成文集《蓟州红》,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其中24篇被收录到蓟州